

“纯粹”与“必然”遭遇“混沌”与“不确定性”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德育困境

易连云，易然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重庆北碚 400715）

摘要：康德哲学影响世界数百年，至今依然具有独特的魅力。本文对康德哲学中关于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思想进行了分析与反思，特别是针对康德所主张的纯粹的义务与道德上的必然性进行了现实的思考，结合自身的理解，指出，在现实的学校道德教育实践中，康德所主张的这种纯粹的理性思辨与绝对必然的道德基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纯粹；必然；混沌；不确定性；形而上学

自康德哲学诞生，至今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然而，我们不得不感慨康德哲学的无穷魅力，如同有人评价的康德哲学如同一个巨大的“蓄水池”。康德之前的哲学不断地流入康德哲学之池中，而康德之后的哲学又自康德哲学的“蓄水池”中源源流出。这一方面说明了康德哲学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康德哲学的强大生命力。作为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康德以其深刻的批判精神以及所创立的“批判理论”[1]，为人类、特别是为西方哲学世界带来了根本性的转变，其影响甚至被誉为哲学界的“哥白尼式转变”，康德哲学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康德在哲学与伦理学思想上的巨大成就已经为世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思想的魅力为世人所折服。

一、康德的道德理想的现实性追问

与康德在人类理性领域所作的批判一样，理性的“纯粹”一直是康德着力努力的目标。当我们在为康德哲学批判的深邃、抽象思考叹为观止，进而产生出思维上的“创新绝望”之情时，不禁产生出对康德批判哲学的批判反思。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康德所期望建立的那种道德的纯粹形而上学基础是否可能？本论文无意从哲学或者伦理学层而探寻康德哲学的思想意义，而是希望仅就康德所追求的纯粹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从教育学意义进行探索，这一方面是因为当今中国，甚至全世界均而对同样的道德难题，而且也因为，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早已经有了康德式的探索，只不过，在中国古人思想中，所追求的并非纯粹，而是心灵的宁静，甚至是具有宗教情怀般的精神的凤凰涅槃般提升，抑或是自然无为般怡然与淡定。这两种思想，一种源于对理性自我的批判与反思，而另一种则是对天地人生规律的自觉与反省。我们在想，这两者是否在今天能够找到彼此理解的穿越时空的通途呢？

在康德对人类的知性领域进行批判之后，他把思维的触角伸向了人类的实践领域。为了解决他心目中的道德难题，康德甚至主张限制科学，目的是为自由留下地盘。在他看来，自由是一个人做出道德行为的基础，没有了自由，也就不存在道德。康德的这一思想无疑对于解决道德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源于哲学家思维的惯性，康德在这之后开始致力于道德的纯粹基础的探寻。

二、“纯粹”道德基础何以可能？

康德认为，极有必要有朝一日去建立完全清除了一切只能是经验性的属于人类学的东西的一门纯粹的道德哲学。因为从义务和道德法则的普通理念就自动地显示出：必须有这样一门哲学。康德指出这种根据的必然性在日常的经验性的世界中是无法寻找到的，只有在纯粹理性的世界中才能找到。所以，任何规范，只要是构建在纯粹经验的原则上的，甚至这个规范只是在某一个方面具有普遍性。“因此，在一切实践知识中，道德法则连同其原则不仅在本质上有别于其余一切包含着任何经验性的东西的知识，而且所有的道德哲学都完全依据其纯粹的部分”[2]。这里我们可以理解康德自始至终所使用的“纯粹”一词，它反映出康德试图建立一门道德形而上学的努力，一种试图找到道德的绝对普遍性根据的探寻。但是，如果离开了经验性的内容，纯粹的道德法则的确立又有何现实意义呢？离开了实践的道德法则就会仅仅比于一种单纯的道德思维训练而缺乏实践性。而人的道德实践又天然地与人类的社会生活实践密切相关，无法设想，离开了现实生活实践的道德准则如何不流于旷野中的空谈与书斋中的孤独沉思。进一步追问，实践知识包括哪些内容？道德法则如果离开人的实践和经验，不以人类经验为依据，这种法则如何在人的实践得以实现，而不至于成为孤立的抽象的教条呢？就人类实践来看，研究者通过广泛的人类学考察，发现了各种不同民族与文化的道德范式，这些范式有着很大的区别，对于人类行为是否道德的认识千差万别，只是在寻求普遍的意义上，康德的这一思想是有益的。这种超越具体经验的道德法则，可以建立起超越民族与文化差别的普遍性道德法则，但是就是这样，也与康德的自身主张相悖的。因为他所主张的是“纯粹”的，或许是康德意识到这种纯粹所具有的难度，他接着又谈到道德的先天法则的经验基础，但并没有直接归结到经验，而是另一个同样抽象的名词：判断力。问题是，这种由经验磨砺的判断力是否与经验相关，而变得不纯粹了呢？康德承认，在日常生活中，人受着各种偏好的影响，因而无法轻易运用自身的纯粹的理性，所以需要一种道德上的判断力，然而，我们不禁思考，人们如果不根据经验，不面对经验，所作的判断能否体现出道德性呢？这也许就是康德面对的真正难题。康德认为，一门道德形而上学是不可或缺地必要的。这种形而上学不仅是为了“探究”先天地存在于我们理性中的实践原理的源泉，同时也是为了保证道德本身不受“败坏”。康德指出，“只要缺乏正确地判断道德的那条导线和最高的规范，道德本身就依然受到各种各样的败坏”[3]。由此，在道德与善的关系上，康德提出了

他的重要观点，他认为：“要使某种东西在道德上成为善的，它不仅仅符合道德法则还不够，而且它还必须为了道德法则的缘故而发生。否则，那种符合就只是偶然的和糟糕的，因为非道德的根据虽然有时会产生符合法则的行动，但多数情况下却将产生违背法则的行动。”[4]

三、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德育困境

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康德哲学对哲学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然而，作为一位教育家，康德哲学思想的教育意义也不容易忽视。教育史的研究中发现，康德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在大学开设教育学课程的教授。从人类思想发展过程来看，哲学作为一个思想宝库与思维工具，长期以来对于传承人类文化；引领社会思潮；推动社会进步和培养人才方面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康德哲学思想在今天应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去探索。

我们看到，康德在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探讨中，做出了相当的努力，并提出了许多精辟的思想和天才般的预见。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难题，如何进行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现实转化？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从何种意义上我们才能开掘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思想实践价值？

我们而对着如下困境：

第一，“善”的纯粹性和学校德育的实效性？

毋庸讳言，基于纯粹的善或者说是义务的道德行为是值得人们敬重的崇高美德，也是人们所推崇的。然而，问题在于何以保证人们所讨论与见证的善是“绝对的”呢？照康德思想来看，我们看一个的行为是否道德，不能仅看其结果是否符合于道德准则，而要看这一道德行为的发出是否根据其内在的绝对命令。因为一个道德的结果原本可以出自于一个卑鄙的动机；反之，一个不道德的结果却可以出自于一个良好的愿望。按康德所主张的善的意志绝对性，他认为“善的意志并不因为它造成或者达成的东西而善，并不因为它适宜于达到任何一个预定的目的而善，而是仅仅因为意欲而善，也就是说，它就自身而言是善的；而且独自来看，其评价必须无可比拟地远远高于通过它为了任何一种偏好，甚至人们愿意的话为了所有偏好的总和所能实现的一切。”他主张的“理性的真正使命必定是产生一个并非在其他意图中作为手段、而且就自身而言就是善的意志。”[5]于是，艰难的情境出现了。如果不看结果，我们何以确定其动机的道德性，而如果我们仅听从当事者对动机的描述而没有看到其付诸于实践，我们又怎么判断其道德动机之真实性呢？从社会与学校德育实践来看，这一问题事关德育的实效性。十多年来，我们对学校德育者工作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在调查中，他们把我国的学校德育缺乏实效性的问题置于首位。从学校到社会，从青少年到成人，一个突出的表现便是知行不一，这其中既有“知而不行”，也有“行而不知”，更有“非知非行”和“非知而行”。这一切均给道德的判断带来无法确定的困难。康德所主张的理性的“纯粹”与“必

然”在社会与学校德育的实践中，遭遇到了“混沌”与“不确定性”。这或可以说是一个理论追求与现实生活的悖论。就如同前而所提到的康德所说的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个善的意志的原理，它们就可能成为极其恶的，而一个恶棍的冷静不仅使他危险得多，而且也直接使他在我们眼中比不具有这种冷静时更为可憎。这一现象在中国的校园里与社会中已经是屡见不鲜，一个个，一场场冷静谋杀与生命残害令人触目惊心。

第二，学校德育中道德的实践逻辑如何彰显？

在社会生活与学校教育中，德育常常被当作为一种实践性活动，甚至就是一种单纯的活动，一种教导人们思想与行为的活动。应该说这种认识具有一定的道理，德育究其实质是关乎人类的社会与生活实践的，它属于人类社会生活活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现实中的问题是，人们仅仅将其视为实践活动，而有意无意地忽略道德实践活动的知性逻辑，也就是说，道德活动实际上也属于一种知性活动，其对道德的判断与理解离开知性的支持将变得盲目和偶然，从而很难形成个人的稳定、持久的生命实践活动。其实，康德并非从一开始便要将理性与感性完全地分离开来，康德认为：“传统的思想方式，不论是理性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妨碍了近代科学的发展，不利于认识的扩大和加深。”[6]为了反对传统的独断论思想，康德便致力于对认识何认产生，认识的局限以及客观有效性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其所作三大批判便是这些探索所结下的丰硕成果。他认为对理性和感性“这两种特性任何一个都不能偏爱。没有感性，对象就不会被给予我们；没有知性，就不能思想对象。思想没有内容是空洞的，直观没有概念是盲目的。……这两种能力不能相互代替。知性不能进行直观，感觉不能进行思想，只有把两者结合在一起，认识才能发生。”[7]这就好象我们在进行学校德育在，对学生的道德行为训练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要知道，离开了理性支撑的道德认识将是空洞的认识，也就没有道德上的知性根据与持久的生命力；相反，如果离开了感性的道德体验，学校德育活动将成为枯燥乏味的道德操练。中国传统中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与“诚意正心”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充分体现了这种感性与知性合而为一的思想精华，这了是东西方传统德育的鲜明的差异与特点。强调个体反思，见贤思齐；力求独善其身，兼济天下。

第三，德育能够成为一种教育活动吗？

早在数千年前，苏格拉底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他在对美德的反思之后，提出了“美德可教吗？”的命题。今天我们所而对康德难题如出一辙。按康德的主张“一个就自身而言就应受尊崇的、无须其他意图就是善的意志的概念，如同它已经存在于自然的健康知性之中，不需要被教导，只需要被启蒙，在评价我们的行为的全部价值时它永远居于首位，并且构成其他一切价值的条件。”[8]这种处在启蒙状态中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善良意志或者说是精神，如果离开具体的实践逻辑与现实操练，其道德德目如何得以体现在学校德育中，并植根于青少年内心深处？假如换个角度进行理解，康德所说的这种善的意志的概念“已经存在自然的健康理性之中，不需要被教导，只需要被启蒙。”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这种启蒙就不算是一种教导吗？更进一步地说，如果我们认可善的意志先天地存在于自然的健康知性之中，那也

就是说,善的意志是先天存在的,并不需要后天的培养,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和现实性。无疑,康德的这一观点是无法令人信服的。现实中的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为着启蒙人们的道德,我们需要道德教育实践;而为着人们道德境界的提升,我们更需要道德上的理性思辨,这是人们道德精神升华的基础和关键。在这一过程中,常常是高尚与卑下并存。基于此,康德自己也论及过此种状况,他指出:“如今,出自义务而真诚,与出自对不利后果的担心而真诚,毕竟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因为在第一个法则,而在第二种情况中,我却必须首先环顾别处,看对我来说可能有什么后果与此相联系。”[9]这也正是道德教育的意义所在。为着上升到出自道德义务的个人情怀,我们必须教导人们审视行为的可能后果,以至于不断地规顺自己的行为,检视自己的思想。而对生活中的种种道德困惑,“我问我自己:我对我的准则(通过一个虚假的承诺使自己摆脱困境)应当被视为一个普遍的法则(不仅适用于我,而且也适用于别人)真的会感到满意吗?我真的会对自己说:每一个人如果处在他不能以别的方式摆脱的困境中的时候,都可以做出一种虚假的承诺吗?于是我马上就意识到,我虽然能够认同说谎,但却不可能认同存在一个可以说谎的普遍法则;因为如果存在这样的一个法则,那就不会再有真正的承诺存在,因为我就自己将来的行为而言对其他人预先确定我的意志,而这些人却并不相信我的这种预先确定,或者,如果他们轻率地相信,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回报我,这种预先确定就是徒劳的,从而我的准则一旦被当成普遍的法则,就必然毁灭自己本身[10]。那种不计后果的教育其实是十分可怕的。

与海德格尔所主张的存在观相比,康德哲学显然是超越时空的。海德格尔关于人的存在的思想属于当下,其基点是其主张的不确定性,而康德的思想则属于纯粹的思辨,其局限因此也就在于离开现实的实践活动去思考实践中的思辨理性,最后竟成了他自己也难以自圆其说的纯粹的思维游戏。不得不承认,其思想对于人的理性能力的训练与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现实的道德教与我们的道德发展却是在具有现实性的理论指导下实践,并在复杂的道德实践领悟道德理论并使自己得以超越现实的混沌……。

参考文献:

[1]康德在其一生进行的大量析学研究中,提出三大批判理论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在三大手对人类的知性与感性可以可能以及它们的边界进行了思考。

[2][3][4][5][8][9][10]李秋零.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M].作全集(第4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9397. 403. 410. 409. 410.

[6][7]苗力田.哲学的开普勒改革[M].李秋零.康德著作全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_2005:2. 3.

"Pure" and "inevitable" encountered "Chaos" and "Uncertainty"

—Moral education Dilemma of Kant's MoralityMetaphysics

YI lianyun, YI ran

Abstract:The influence of Kant's philosophy lasts for hundreds years. Till now, it is also unique charm. This Article did some analysis and reflections of Kant's morality metaphysics, especially did the realistic thinking on Kant's pure obligation and the inevitable of moral.

Key words:According to the own understanding of author, In the real practice of school moral education, there are some limitations of Kant's mind.

本文选自：《教育科学》2013 年第 6 期